

是哲学理念,而是更贴近作为人学的文学、更科学、也更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一种归纳。它是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伟大民族精神复兴的主题紧密联系的。

“五四”时期,鲁迅先生承继晚清梁启超等人的“新民”主张,提出了“立人”思想,自觉地以“改造国民性”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sup>①</sup>。鲁迅先生的这一追求,虽不能包容全体,却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显现出中国现代小说的主导思想脉络。比如《阿Q正传》就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追求,阿Q遂成为共名。在对阿Q的阐释中,有人指出它表现了人类性的弱点,固然不无道理,但它首先是写出了中国的沉默国民的灵魂,写出了中国农民的非人的惨痛境遇,以及他们的不觉悟状态。“民族灵魂的发现”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没有中断,只是它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巨大声浪的覆盖下以更隐蔽的形式潜在着。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精神重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矛盾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心态。这一形象即使在当时,也被有些人认为是最成功的,其魅力到今天也没有散失。到了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让人过目难忘,有人评论说,“陈奂生性格”是国民性格中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我们还可以从《原野》的仇虎到《红旗谱》的朱老忠再到《红高粱》的余占鳌,清楚地见到中国农民代代相传的英雄梦想和对原始强力的渴望。在诸多理想型的人物中,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这一形象的文化意蕴颇为复杂,也很新颖,至少以前没有人这么直接把性格诉诸文化。他的思想是保守的、倒退的,但

他的人格却充满了沉郁的美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境界,东方化的人之理想。这里包含着作者对中华文化及其人格精神的观照与思考。在关于知识分子主题的作品中,其发展脉络同样曲折复杂,但贯穿性清晰可见。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这一叛逆者的疯言疯语,使我们感同身受一个“独战庸众”的个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有所发现的紧张,以及最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的苍凉心境;在钱钟书的《围城》里,方鸿渐是个充满了自我矛盾的人物,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多余人”。在几十年后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里,倪吾诚上演了另一出文化性格的悲剧,他向往西方文化,却无时不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之中,被几个乖戾的女性折腾欲死,受虐而又虐人,忍受着无可解脱的痛苦。在杨绛的《洗澡》里有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弱点的解析;在宗璞《东藏记》里有对知识分子节操的追问,这些都是这一主题的延展。同时,我们在《活着》、《小鲍庄》、《日光流年》、《笨花》、《生死疲劳》、《玉米》里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对民族文化性格中的惰性因素的深刻挖掘,也有对其中的现代质素如执著、坚韧、顽强并将之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的大力弘扬。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人性决定“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主线索并不是单一的、静止的,它是一条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延伸的主线,它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对国民性的发现到对现代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深沉思考,从较狭窄的视角走向宏阔的文化视野,它将伴随着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而不断地深化下去。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作者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大学文学院)

## 新时期文艺:风起云涌三十年

云 德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革,当代文艺同样也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三十年间,文艺各领域全方位的探索创新和文艺各门类的佳作迭出,迎来当代文艺创作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其突出特点有三:

一是当代文艺同社会发展进程紧密相联,在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指原来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指文艺在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结中,作家对于社会生活

变迁和人民大众疾苦痛痒的倾心关注与精神关怀。其中既包括文学反映客观生活现实,也包括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参与,即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的方式融入文艺创作活动之中去,并成为当下文艺的一大亮色。“伤痕文学”始于卢新华同名小说《伤痕》,作品通过知青王晓华和她母亲的矛盾冲突,描写了“文革”在两代人心理上造成的沉重创伤。这种沉重的创伤是“文革”带给广大群众最为普遍的心理伤痛。同期的《班主任》、《小镇上的将军》、《内奸》、《月食》、《李顺大造屋》、《灵与肉》等等,都直接把控诉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用强烈的义愤和鲜明的爱憎直面人生,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共鸣,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序幕。文学在这个时期走到了时代思想解放的最前列。而接下来的“反思文学”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进一步深化。从“反思文学”之后,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延续“伤痕文学”直接触及现实问题的创作风尚,“改革文学”乘着社会变革的东风迅速走上文坛。《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既感奋时代进步,又触及生活时弊,用一种激昂豪放的声音,奔腾向上的气势,为改革摇旗呐喊、大声疾呼,表现了一种急于改变现状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心情。而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文学反思的深入,借鉴国外文学表现手法,以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和以王蒙《春之声》为发端的“意识流小说”走红起来。他们借用外来形式或形式的变型隐晦地表达着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到了“新写实主义”的出现,文学开始了新一轮的现实主义回归,当代文学再次找到了与现实社会的契合点。“新写实小说”长于描写生活的原生态,追求原汁原味原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简单重复,而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激荡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塔铺》、《风景》、《烦恼人生》、《单位》、《分享艰难》等都采用传统的全知视角、顺时序的结构形态叙写底层社会人生,它们所展示的琐细的逼真的甚至有些残酷的生活现实,虽然在不动声色中娓娓道来,没有太多的典型化处理,但它却深切地揭示出芸芸众生当下的一种活生生的生存状态,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大众化平民化的追求,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人生的态度与现实主义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影视创作从《泪痕》、《孽债》、《天云山传奇》等反思“文革”伤痛的作品开始,在关注着当下社会变革现实的同时,也注重回顾和反观中国现代历史的进

程,像《高山下的花环》、《中国神火》、《士兵突击》、《西圣地》、《戈壁母亲》,还有包括《长征》、《延安颂》、《井冈山》、《历史的天空》、《亮剑》等一大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既谱奏出一曲曲普通人献身理想和事业奉献精神的雄浑交响,也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的开天辟地的领袖人物和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描绘出中国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的悲壮历程。这些作品关注社会与人生,不仅是社会功利问题,更是文艺审美观念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本质需求。无论是对英雄人物和牺牲精神的颂扬,还是对丑恶势力和不良行为的批判,无论是对社会进步的礼赞,还是对历史痼疾的反思,新时期文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的起点和归宿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沉思和探索,都怀有一腔变革现实、强国富民的热望。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说到底概源于现实主义的精神。

二是新时期文艺在恢复和发展“人学”的过程中始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人性的发掘和开拓超过以往任何时代。新时期文艺界正本清源的结果,“阶级斗争的工具”被放弃,“文学是人学”的概念重新提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苏醒与恢复得到社会广泛认可。“人”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及其理论批评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成了作家艺术家创作中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文学一开始就从“造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与“造鬼”(牛鬼蛇神)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谢惠敏(《班主任》)、王晓华(《伤痕》)被扭曲了的心灵和情感,因失手倒放了领袖镜头而长期蒙受政治冤屈的女放映员(《记忆》),一代知青痛苦的下乡回城经历(《生活之路》、《调动》),在逆境中受新贵奚落且又重新赢得人民群众尊敬的老将军(《小镇上的将军》)等,都在展示人物曲折命运时,刻画了人性在特殊的岁月里经受的磨难和痛苦。如果说早期的作品大多还只停留在人物悲剧命运的表层描写上,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反思的深入,人们开始了对国民性严肃地自审与自省,开始研究人性和历史深层的东西,摒弃善恶二元对立的人的复杂因素得到重视,人的意识进一步觉醒。《芙蓉镇》、《三生石》、《盖棺》、《人生》、《爬满青藤的木屋》、《人到中年》、《杂色》等都较好地把握了人物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物所处的特殊社会关系,触及到人性的内在底蕴,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一大批反映经济变革以及商品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变化的作品问世。像小说《商界》、《抉择》、《大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中国制造》,以及电视剧《渴望》、

《蹉跎岁月》、《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奋斗》、《金婚》等,都毫不掩饰地尖锐而又真实地揭示了当下人们的生存境况,关注社会转型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写出了经济困境中人们的迷茫、苦闷和潜能发掘以及命运抗争的奋起与突围,张扬了人们重构人生价值观的困惑与执着,显示着当代作家对普通劳动大众最为直接的人道关怀。

通过两性关系的实际状况来探究人性的价值和意义。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啊,人》,到《玫瑰门》、《长恨歌》、《情爱画廊》、《金婚》、《中国式离婚》等,都注重突破人性和性爱描写的禁区,透过人情、人性以及欲望宣泄表现两性之间的情感撞击、灵魂交流和思想纠葛,折射人生命运、社会风尚、伦理道德和心理意识的变化,深刻描写了普通人性的真善美,开掘出凡俗生活中的深情蜜意。尽管一些作品也存在宣扬抽象人性,或着意描绘生理快感和动物性本能渲染畸变的性爱,甚至把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视为人性的标尺,使人性的探索走向反面,但真正宣扬人性论和色情的文艺作品只是极少数,探索人性的作品总体上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所揭示的人性深度应予以充分肯定。

三是当代文艺审美的回归和文艺自主意识的觉醒,艺术本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张扬。康德把审美引入文艺,认定人有知、情、意三种心理结构,其情是指情感判断力,其产物就是合目的性的艺术。拨乱反正伊始,尽管当时的创作充满了政治内容,但不再是政治斗争的宣传品,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自足体,自觉承担起了审美功能。重视文艺的审美让一度盛行的题材决定论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对于生活的审美认识方式成为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在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反映论”继续为大家采用的同时,文艺对生活的表现、感应、幻想和变形在创作中有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像《减去十岁》、《全是真事》、《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蝴蝶》、《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孕妇与牛》、《那五》、《黑骏马》、《老井》、《迷人的海》、《小鲍庄》、《古船》、《芙蓉镇》、《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内容的表达还是形式的创新,都是极为明显的。在这里,似曾相识的文学共性成为作家有意识回避的东西,美文学越来越成为作家主动追求的目标。

注重从中学学习吸收其有益营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自身成功经验,灵活运用外来艺术中的创作技巧,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改写了当代电影的发展篇章。特别是对艺术审美高度重视,使导演艺术的个

性开始在电影创作中广泛呈现。电影市场上既出现了一系列像《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血战台儿庄》这样再现中国革命历史的重大题材电影,也出现了像《邻居》、《心香》、《人到中年》、《本命年》、《背靠背脸对脸》等表现普通百姓喜怒哀乐的影片;既出现了像《芙蓉镇》、《巴山夜雨》、《黑炮事件》这样表现灾难性历史境遇中人性的挣扎和坚守的影片,也出现了《老井》、《野山》、《秋菊打官司》这样表述当代人在社会转型状态下的生存体验的影片;既有像《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投名状》、《集结号》这样的国际化大制作商业影片,也有《喜盈门》、《男婚女嫁》、《甲方乙方》、《疯狂的石头》这样完全本土化的通俗电影,还有那些诸如《城南旧事》般感伤而抒情的散文诗电影《黄土地》、《一个和八个》那样富于象征性的探索电影以及《爱情麻辣烫》那样的组合形态电影……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电影的内容、风格、类型、样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具备盛世气象。

同样表现在话剧舞台上,种种现代观念和戏剧因素的吸收也引起了新的艺术表达方式变革,催生了一批意蕴丰赡、样式新颖的剧目。比如《绝对信号》、《车站》、《对十五桩离婚案的剖析》、《街上流行红裙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魔方》、《天边有一簇圣火》、《同船过渡》、《商鞅》、《地质师》、《岁月风景》、《父亲》、《虎踞钟山》、《生死场》、《我在天堂等你》等,都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舞台上,以其独特个性受到关注。

新时期文艺不仅在热情讴歌人民群众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的生动实践,展现人民共和国奋进发展的壮丽画卷,记录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抒发新世纪新阶段我国人民对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和时代风采,同时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和文艺自身发展的需要、不断为人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向前发展。无论就其思想深度的广泛开掘,还是就其艺术表现力的巨大进步,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各种思想观念和形式的多元互补中逐步走向了繁荣。

中国当代文艺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奋斗,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财富,也为今后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下一个三十年,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给予更加美好的期待。

(作者单位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